

长安:西汉经学的“天府”

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西汉长安曾经表现出世界都会的气象。这里是西汉帝国经济和政治的中心,也是文化的中心。在经学兴起的时代,这里实现了经学主导地位的确立。经学人才的空前集中,经学论著的收藏和传播,经学的研究和经学的教育,也以这里为中心。长安,可以称作西汉经学的“天府”。考察西汉文化史和西汉思想史,不可以不重视西汉经学在长安的地位和影响。而中国经学史中的若干疑问,或许也可以因长安经学问题的说明得以更好的澄清。

关键词:西汉;长安;经学;研究中心

中图分类号:K207;K23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1)01-0001-06

长安作为西汉王朝的都城,曾经表现出世界都会的气象。这里是政治和经济的中心,也是文化的中心。《史记》和《汉书》所见区域政治与区域经济评价,六见“天府”的说法,其中五次是指关中。如苏秦语:“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1] 娄敬语:“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1] 张良语:“夫关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1] 如果借用“天府”一词来形容其区域文化优势,也是适宜的。正是在西汉长安,经学的主导地位才得以确立,经学的人才空前集中,经学论著的收藏和传播,经学的研究和经学的教育,也以此为中。长安,可以称作西汉经学的“天府”。

一、长安与齐鲁文化的西渐

西汉时期,是先秦时代已经成熟并分别形成深

刻影响的楚文化、秦文化和齐鲁文化相互融汇的历史阶段。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是全国政治重心在关中地方确立之后,齐鲁文化的西渐。

齐鲁地区基础深厚的文化,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对周边地区发生重要影响的显著领先的优势。《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太史公曰: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史记》关于地方民风,除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及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言匈奴“天性”外,只言及齐民“天性”和“齐鲁之间”“天性”)。秦汉时期,齐鲁文化在保持自己个性的同时,又积极参与了“远迹同度”^[1]的文化共同体的建设。秦最后灭齐,

收稿日期:2010-11-15

作者简介:王子今(1950-),男,河北武安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秦始皇东巡,表现出对包括神祀体系的齐鲁文化传统的某种尊重。齐鲁作为历史悠远的文化高地,各地人们皆不得不仰视,甚至连嬴政这样的强势政治人物也不能例外。秦始皇当政时,据说“天性刚戾自用”,“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以其绝对的刚愎自信,却仍然“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在他的高级咨政集团中有许多儒学博士担当政治文化顾问。秦始皇廷前议地方行政格局事,至湘山祠问湘君,海上“求芝奇药仙者”等,都曾经听取他们的意见,“上邹峰山,立石”,又曾经直接“与鲁诸儒生议”。就所谓“坑儒”这一著名冷酷的集体残杀儒学之士的血案来看,当时在秦王朝统治中心咸阳,“诸生皆诵法孔子”者,仅“自除犯禁”而“坑之咸阳”的竟多达460余人^[1]。

刘邦的汉军在歼灭项羽军之后,“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颅视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1]原秦博士,出身于鲁国薛地的叔孙通被刘邦拜为博士,号稷嗣君。他“征鲁儒生三十余人”西行,合作帮助汉王朝制定朝仪。成功后,刘邦感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1]。鲁地儒生拜为九卿,使儒学的影响第一次可以托附于政治权力的作用而空前扩展。

继秦始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1]之后,西汉政权策划迁徙关东贵族豪杰名家居关中时,首先想到的又是“徙齐诸田”^[1]。这一政策也许也是齐鲁经学向西部地区传递的一个重要契机。

汉武帝时代,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得以彻底确定。齐地儒生公孙弘相继任博士、太常、御史大夫、丞相,封平津侯,是标志儒学地位开始上升的重要文化信号。《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记载:“公孙弘以《春秋》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士靡然向风矣。”公孙弘作为齐鲁儒生的代表,建议各地荐举“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加以培养,充实政府机构,“以文学礼义为官”。这一建议为汉武帝认可,于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1]。

陈直曾经著文论述西汉时期齐鲁文化人的学术艺术成就,题为《西汉齐鲁人在学术上的贡献》。其中凡列举九种,即:(1)田何、伏生等的经学;(2)褚少孙的史学;(3)东方朔的文学;(4)仓公的医学;(5)尹都尉的农学;(6)徐伯、延年的水利学;(7)齐

人的《九章算术》;(8)宿伯年、霍巨孟的雕绘;(9)无名氏之书学。陈直先生主要讨论了齐鲁人以上九种文化贡献,其他“至于《汉书·艺文志》所载师氏的乐学,《律历志》所载即墨徐万且的历学,《曹参传》所载胶西盖公的黄老学,其事实不够具体,故均略而不论”^[2]。在齐鲁文化对社会的影响之中,经学被列为第一,是符合文化史的实际的。

长安因政治重心西移得以吸引齐鲁文化西渐^[3]。作为帝国的都城,长安又是齐鲁文化向西扩展影响的主要目标。长安以积极的态度迎接这一历史变化。然而这里并不是儒学向西传播的终点。从儒学向巴蜀和河西等地普及的文化轨迹看,长安实际上又承担了经学传播中继站的重要作用。

二、石渠千秋

汉代开创了中国古代图书收藏史的新阶段。其重要成就是经学论著的收藏,而长安成为经学论著收藏和进一步传播的中心。

在儒学地位空前上升的背景下,汉武帝命令广开献书之路,又设写书官抄写书籍。按照《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的说法,汉武帝时代,“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刘歆《七略》说,当时的藏书机构,“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这说明当时集中了相当数量的书籍,外廷有太常、太史、博士等部门的收藏,宫内又有命名为延阁、广内、秘室的书库。汉成帝时,又进一步访求天下遗书,并指令刘向总校诸书。刘向的儿子刘歆继承父业,在校书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儒学经典的不同底本。他宣布自己发现了古文《春秋左氏传》,还说发现了《礼》三十九篇(《逸礼》)以及《尚书》十六篇(《古文尚书》)。这两种书据说都是鲁恭王坏孔子旧宅时所得,由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献入秘府的。刘歆要求把这些书立于学官,并且与反对这一主张的博士进行激烈的论辩,于是经学中出现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个流派。唐人崔日知“孔壁采遗篆,周韦考绝编”的诗句(《石仓历代待选》),又如元人柳贯诗所谓“孔壁发神秘”(《待制集》),王逢诗所谓“简册潜回孔壁光”(《梧溪集》),也都是对“孔壁”图书发现的感叹。汉长安城出土的“石渠千秋”瓦当,可以看作这种文献学成就的纪念。

汉代的国家藏书有了确定的制度,而民间图书收藏也有可观的规模。最典型的例证也发生在长

安。《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病重,汉武帝吩咐臣下:“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者前往司马相如家,“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这里所说的“家无书”、“未尝有书”,是指司马相如的论著,而并非图书收藏。《后汉书》卷八二下《方术列传下·王和平》记载:“北海王和平,性好道术,自以当仙。济南孙邕少事之,从至京师。会和平病歿,邕因葬之东陶。有书百余卷,药数囊,悉以送之。后弟子夏荣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宝书仙药焉。”北海方士王和平由弟子孙邕陪伴前往京师,不幸途中病逝,安葬在东陶。所有图书百余卷,都随葬于墓中。后来听说王和平尸解成仙,孙邕于是悔恨当初不如取其“宝书”以为私有。从王和平出行携带图书多达百余卷,可以推想其收藏文献的数量。这是一个图书随主人向“京师”集聚的故事。这里所说的“京师”当然是洛阳。但是西汉时期儒生西行长安必然携带常用图书的情景,是可以由王和平事迹推知的。

三、《法言》“书肆”与“槐市”传说

西汉思想家、文学家扬雄在《法言·吾子》中写道:“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强调应当理解和领会孔子的思想实质,而不仅仅是熟悉和爱好孔子的文字言谈。关于“书肆”,注家解释说:“卖书市肆,不能释义。”涉及到“书肆”的这句话,可能是关于出售书籍的商店的最早记载。扬雄的意思,是说如果只是喜欢孔子的书而不懂得其中的真义,则不过只是陈列和出售书籍的店铺而已。《法言》中所说到的“书肆”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文化信息:在秦始皇推行焚书之令、制定挟书之律的政策成为历史之后,民间书籍流通显现出新的形势,长安地方专营图书销售的“书肆”已经出现。扬雄是在讨论“仲尼”思想的时候说到“书肆”的,由此可知在这样的图书传播场地,经学书籍很可能是流通的主体。

记录汉长安城地方风俗制度的《三辅黄图》一书中,说到长安有一处特殊的市场“槐市”。据《艺文类聚》卷三八引文“列槐树数百行为隧,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相与买卖。雍容揖让,论说槐下。”都城中有以槐树为标志的专门设置的空地,国家官学的学生们在月初和月中聚会在这里,以家乡土产以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彼此交换,“相与买卖”。这

样定时交易的图书市场,参与流通者是特定的人群。所谓“雍容揖让,论说槐下”,形容了这个特殊市场的特殊文化氛围。唐代诗人刘禹锡有“学古游槐市”诗句(《刘宾客文集》)。刘禹锡又写道:“槐市诸生夜对书,北窗分明辩鲁鱼”(《刘宾客文集》)。又如宋代诗人葛胜仲诗:“旧直蓬山无俗梦,今官槐市有清阴”(《丹阳集》)。周必大也有这样的诗句:“君不见,汉京辟雍载《黄图》,博士直舍三十区,分行数百曰槐市,下有诸生讲唐虞”(《文忠集》)。似乎“槐市”的商业色彩较为淡薄,而学术气氛相当浓烈。后来文人们习惯或以“槐市”与“杏坛”并说^①,或以“槐市”与“兰台”为对^②,又有“槐市育才”(《梅溪后集》)、“槐市育材”(《榭溪居士集》),以及“太学曰槐市”(《绀珠集》)等说法,也以“槐市”作为文化机关和教育场所的象征。“诸生”所经营的“经传书记”,可以明确主要是经学图书。

四、经学研究的中心

《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儒学被最高执政者重视,其契由正是发生在长安经学的一次实际应用。据司马迁记述,“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轅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在长安确立最高执政中心的汉王朝努力招募人才,除了吸引各地学者参与议政和行政之外,还殷勤邀请经学专家来京师。此所谓“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于是长安成为经学研究的中心。

申公曾在长安求学,后又来到长安。《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写道:“吕太后时,申公游学长

^① 如唐代黄滔《谢试官》:“得槐市三千,杏坛七十”,《黄御史集》卷七《启》;宋代杨亿《景德二年三月试草泽刘牧策第二道》:“复杏坛槐市之规,遵小成大成之制。”《武夷新集》卷一宋代欧阳修《早起府学释奠》:“雾中槐市暗,日出杏坛明。”《文忠集》卷五六。

^② 如宋代苏轼《次韵徐积》:“但见中年隐槐市,岂知平日赋兰台。”《东坡全集》卷一五。

安,与刘郢同师。已而郢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学,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据《汉书》卷六《武帝纪》,汉武帝刘彻位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议立明堂。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颜师古注：“以蒲裹轮，取其安也。”《前汉纪》卷一〇的记载是：“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议立明堂。申公年八十余矣。”直接动因似是就经学与行政结合的具体问题请教。经学专家和民安的关系，通过申公的故事可以得到鲜明的体现。

《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班固称曰：在汉武帝重视儒学文化建设，“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之后，“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这些人物集中于长安，更强化了京师作为经学研究基地的文化影响。

以梁丘贺为例，《汉书》卷八八《儒林传·梁丘贺》记载：“年老终官。传子临，亦入说，为黄门郎。甘露中，奉使问诸儒于石渠。临学精孰，专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经，闻临说，善之。时宣帝选高材郎十人从临讲，吉乃使其子郎中骏上疏从临受易。临代五鹿充宗君孟为少府，骏御史大夫，自有传。充宗授平陵士孙张仲方、沛邓彭祖子夏、齐衡咸长宾。张为博士，至扬州牧，光禄大夫给事中，家世传业；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讲学大夫。繇是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由此一例，亦可以大致得知长安经学的学术渊源和传递方式。经学名家往往同时又是朝廷大员，经学和行政的关系也因此明朗。

据《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交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云”。李约瑟说，这是在王莽的倡议下召开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科学专家会议”^[4]。经学研究人才的集中和经学研究水准的提升又达到新的程度。

五、太学：经学教育的基地

长安除了作为经学研究的中心而外，也是经学教育的最重要基地。

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举措，是兴太学。《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记录汉武帝的指示：“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与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广贤材焉。”公孙弘建议：“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痒。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太学的创建，采用了公孙弘制订的具体方案。公孙弘拟议，第一，建立博士弟子员制度，将博士私人收徒定为正式的教职，将私学转变为官学；第二，规定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第三，博士弟子得以免除徭役和赋税；第四，博士弟子的选送，一是由太常直接选补，二是由地方官选补；第五，太学管理，一年要进行一次考试；第六，考试成绩中上等的太学生可以任官，成绩劣次，无法深造以及不能勤奋学习者，令其退学。汉武帝批准了公孙弘拟定的办学方案。《汉书》卷八八《儒林传》：“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汉昭帝时，“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汉元帝时，“更为设员千人”。“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据《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在王莽专政时代，长安曾经一次即“为学者筑舍万区”，又扩展经学研习和传授名目，“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其中“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出内及外”的意见，值得我们重视。

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学于是出现。《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说，汉武帝创办太学，是接受了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的献策。董仲舒指出，太学可以作为“教化之本原”，也就是作为教化天下的文化基地。他建议，“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这样可以使有志的学者“以尽其

材”,而朝廷也可以因此得天下之英俊。所谓“养天下之士”,体现出太学在当时有为国家培育人才、储备人才的作用。

太学的兴立,进一步有效地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改变,一般中家子弟入仕的门径得以拓宽,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机会。东汉太学生运动受到较多关注。吕思勉还注意到,早在西汉,已经发生过太学生请愿运动。他写道:“今世学校,有所谓风潮者,汉世即已有之”,并举《汉书》卷七二《鲍宣传》所见太学诸生为营救鲍宣,拦截丞相乘车,并守阙上书事^[5]。田昌五、安作璋也对这一史事有所关注,指出:“由于太学生中不少人来自地主阶级的下层,对外戚、宦官集团的横行无忌和瘫痪腐化十分不满,因而不断酝酿着反对当权集团和改良政治的运动。西汉哀帝时,他们曾声援因反对丞相孔光而获罪下狱的司隶校尉鲍宣。”^[6]对于汉哀帝时的这起政治变故,在《汉书》卷七二《鲍宣传》的记述中可以看到如下情节:“丞相孔光四时行园陵,官属以令行驰道中,(鲍)宣出逢之,使吏钩止丞相掾史,没入其车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隶官,欲捕从事,闭门不肯内。宣坐距闭使者,亡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狱。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车不得行,又守阙上书。上遂抵宣罪减死一等,髡钳。宣既被刑,乃徙之上党,以为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长雄,遂家于长子。”西汉长安的太学生运动是东汉洛阳太学生运动的先声。以“王咸举幡”为标志的这一事件,表现了青年知识人作为执政集团的后备力量在进入官场之前即主动参与政治活动的社会责任心。这种责任的正义性长期受到肯定和赞誉。事件发生的场地在长安太学,又是以经学为学术方向的学人们的表演,因此特别值得我们重视^[7-8]。

汉武帝时代,除了建立太学之外,还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而长安的太学,是各地经学教育系统的领导和典范。

六、从西汉长安的文化地位看正统意识形态与政治主导的关系

自西汉时代起,以儒学为主体的正统意识形态形成了政治主导作用。这是此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政治文化现象。此后这一形式经后世王朝继续沿承,得以凝定化,又影响了中国政治风貌和政治生活长达两千年。

经学的兴起,是这一历史变化中最显著的现象。“罢黜百家,表章《六经》”^[9]，“推明孔氏,抑黜百家”^[9],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是汉武帝时代影响最为久远的文化政策。汉武帝贬抑黄老刑名等百家言,大力起用文学儒者,齐鲁儒学之士纷纷西行,进入执政集团上层。儒学学者在文化史的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结束,中国文化进程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变化是和以“汉”为标号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形成大体同步的。现在总结汉武帝时代思想文化的格局时,多使用“独尊儒术”的说法,其实这种表达方式出现较晚,不能准确地反映历史真实。当时最高执政集团的统治方略其实是“霸王道杂之”。即使对汉武帝决策多所谏议的儒学大师董仲舒,终生也未能真正显达。于是《艺文类聚》卷三〇引董仲舒《士不遇赋》有“呜呼磋乎,遐哉邈矣!时来曷迟去之速矣”,以及“遑遑匪宁祗增辱矣,努力触藩徒摧角矣”等感叹。宋人诗句“追惜汉武世,仲舒道确确”(《徂徕集》),描绘了历史的这一侧面。当然,这一执政策略的灵活性,并不能够动摇儒学作为主体意识形态理论基础的地位。

七、结 语

西汉时期,长安作为政治都会和文化重心所在,成为经学发育的主要园地。西汉长安的文化地位,使得中国政治文化格局的形成和政治体制发展的走向,大体得以确定。就西汉时期经学的大体形态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有学术史的意义,也有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意义,对于从区域文化研究的角度说明长安的历史地位,也是极有价值的工作。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 陈直. 西汉齐鲁人在学术上的贡献[C]//陈直. 文史考古论丛.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182.
- [3] 王子今. 秦汉时期齐鲁文化的风格与儒学的西渐[J]. 齐鲁学刊,1998(1):49-53.
- [4]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M]. 佚名,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 [5] 吕思勉. 秦汉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 田昌五,安作璋.秦汉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 王子今.王咸举幡:舆论史、教育史和士人心态史的考察[J].读书,2009(6):12-19.

[7] 王子今.西汉长安的太学生运动[J].唐都学刊,2008,24(6):1-5.

[9]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Chang'an: the place for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West Han Dynasty

WANG Zi-jin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Chang'an in the West Han Dynasty was already a metropolis. It was the center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of the West Han empire.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emergence of Confucian classics study, it was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t, with a great clustering of the experts on the field and a wide spread of its ideas and collection of its works. Therefore, it was known as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and educ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At present, when the investigation for the culture and ideology of the West Han Dynasty, the posi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Chang'an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And many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field can, probably, be solved if further study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is carried out.

Key words: West Han Dynasty; Chang'an;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study center

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和影响力最大的都城,先后有13个朝代建都于此,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城市史、1100多年的国都史。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形成了以长安为载体的长安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经过对长安文化多年来的潜心研究,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李炳武教授于2005年提出了“长安学”学科概念。他认为,长安学是依托于周秦汉唐文明、对以古代长安为中心的陕西历史文化进行全面研究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并系统论述了开展长安学研究的重大意义和初步规划。

为推动长安学学术研究,促进长安学学科发展,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伟大精神,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历史借鉴、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长安学研究中心与《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从2010年第1期开始联合推出“长安学研究”栏目,李炳武教授为栏目主持人。

欢迎专家学者垂询赐稿!

长安学研究中心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2011年3月15日